

【专题：教育社会学】

华侨华人二代的 反向教育流动与社会适应

张 慧 张晓风

内容提要：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但是针对华侨华人二代^①作为留学生的教育移民经历以及反向文化冲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了成功入读国内顶尖大学的华裔留学生个案来讨论，与学业上的成功相比，这些学生的早期教育流动与社会和文化适应问题对她们回到中国的再社会化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本文分析了冲突性教育原则、两代移民价值导向的差别、家庭分离经历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反向教育流动与社会适应的影响。与以往强调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的研究不同，本文从二代的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反向教育流动容易产生易被忽视的社会适应问题，“以学业为先”的教育原则也为二代移民的跨文化适应制造了不同程度的障碍。

关键词：华侨华人二代；华裔留学生；教育人类学；教育流动；社会适应

在教育人类学的分析中，教育的核心涉及学校、教师、家长、社区、对儿童的认知、教育的文化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力对于教育的综合影响和决定性作用(庄孔韶,2000;刘谦,2016;刘谦、姚曼,2018)。教育(无论是家庭

作者简介：张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等；张晓风(Krzysztof Kardaszewicz)，华沙大学移民研究中心调查员、华沙大学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感谢肖索未、朱宇晶、陈颖军以及两位匿名评审对本文的建议和帮助，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16BRK032)。

① 本文中的华侨华人二代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为外籍或取得了当地长久居留权的人士。一般意义上，侨居国外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称为华侨，已加入或取得所在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称为华人，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后代称为华裔。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华裔，其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华侨或华人。一些研究将这一群体统称为华裔留学生，但是本文特别强调了华裔作为移民二代的成长环境和家庭中两代移民的教育理念差异，因此使用“华侨华人二代”来指称。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需要承担社会性的功能,教育“是教育者、教育过程和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培养受教育者拥有与社会相适应的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过程,是一个把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过程”(滕星,2017:204)。目前,新的教育民族志研究“旨在回应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跨界联系及其权力关系。田野工作图景与问题意识的变化使教育民族志研究从单一场域的文化模式转向跨界的关联与联系,挖掘在场与不在场因素对教育的共同影响”(吴晓蓉、李海峰,2020:213)。

华侨华人二代的受教育经历是教育人类学研究中的特殊案例。这种受教育经历不仅仅以流动以及不同的语言学习和跨异文化适应为特征,其流动的方向往往还是不确定的、非单向、不固定的,每一次变动可能都具有实验性质,如果走不通则需要改变方向。而且每一次的变动往往也伴随着家庭的巨大变动,导致变动的因素,包括父母职业、婚姻关系的变化乃至全球经济状况(比如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对地位等更为宏观层面的变化。从这些华裔自身的感知和讲述来看,变动通常是这样的:“我以为像以前一样回国待一段时间,没想到就再也没回委内瑞拉”“反正我一直是一个人(父母不在身边)”……在她们的描述,尤其是对童年流动的叙述中,这些关键事件往往是以“突然”“完全没想到”“也没人告诉我”“地狱般的一段生活”这样的字眼表述的,她们的伤心、遗憾、低落、崩溃只能在之后的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甚至是在父母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默默消化,直到可能的下一个变动的到来。

这一群体受教育的特殊流动经历与两代移民间家庭教育策略、文化价值观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往往被忽视的华裔回国后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近三年(2017—2019年)来在北京、上海、温州、华沙等地对华裔子女、华侨华人父母、相关教师等群体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参与观察、个人访谈以及焦点小组访谈。以此为基础,本文重点选取了其中六人^①的深入访谈资料作为本文分析的主体,尤其强调了这些年轻华裔自身的视

① 为保护被访者,其姓名和一些信息已经做了匿名化处理。本文所涉及的所有访谈者都是女性,我们也尝试访谈了一些男性华裔二代,但是访谈内容都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他们也更难敞开心扉。相较而言,女性被访者对自身的经历有更多的反思,尤其是更不介意坦承其脆弱和受伤害的经历,也更不介意分享,这种性别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访谈是用被访者觉得方便的语言进行的,包括中文、英文和波兰文。每个访谈的编号中都标注了访谈进行的时间、地点和所使用的语言。

角和声音。目前针对华侨华人二代反向教育流动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这六个案例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反向社会适应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性,六位受访者都有在中国和海外往返就学的经历,都在学业上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但是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适应问题。本文旨在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这些个案来探索华侨华人二代反向教育流动过程中遇到的教育理念冲突、社会性断裂等问题。

一、华侨华人二代的反向教育流动

近些年,受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倾斜的双重影响,“海外华人华侨回国趋势明显,从近十年国家‘千人计划’引进海外人才的人数上就可以看出,华人、华侨学者占绝大多数”(齐凯等,2019:7)。“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有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不足以大力引进非外籍华人的外国人才”,“外国人才的绝对主力、引进外国人才政策的最重要服务对象,实践中,都是外籍华人”(刘国福,2018:24)。换言之,目前的外国人才引进政策,以及相关政策倾斜对于海外华人、外籍华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在这种动力下会有一部分的海外华侨华人子女选择回国接受高等教育。

已经获得外国国籍的华侨华人子女如果想回国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作为留学生参加各个大学的筛选。许多高校近年来录取留学生多采取“申请-审核制”(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留学生使用所在国的高考成绩即可申请,相应高校会设置考试、面试、复试等不同环节。也有的学校会专门设立留学生考试,但是也有争论认为留学生考试对于华裔有更大的优势。^①为方便华侨子女(未获得外国籍但侨居海外的华侨子女)回国接受高等教育,教育部还单独设置了入学考试,即“华侨港澳台高考联招”。这一考试的科目与高考类似但是题目比高考简单,录取分数低,而且如果分数不够也可以选择先上一年预科^②。总体而言,华侨华人二代回

^① 鉴于以外籍身份参加留学生考试较之高考有分数优势,对教育公平可能带来损害,教育部于2020年5月发布了《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详见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10/content_5518369.htm。

^② 对于考生的具体要求详见:http://eea.gd.gov.cn/lhzs/content/post_3180224.html。

国入学顶尖大学存在一定的制度优势,因此回国入学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此外,很多海外华人父母认为国内的基础教育比较扎实,竞争性环境对孩子是一种督促,所以选择在早期教育阶段(如小学、中学)送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同时确保子女具备一定的中文语言能力(如参加相关夏令营等短期培训)。也有一些子女受限于所在国的入学要求,选择先在国内接受教育,等身份问题解决了再到国外就学。华侨华人子女群体的教育流动并不鲜见,不同类型的反向(回国)教育流动也呈上升趋势。

对华侨华人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的新热点。张晓风研究了从中国举家移民到波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移民的重要动机是逃避国内竞争过于激烈的教育环境以及过于单一的对于成绩和成功的评判标准,为孩子寻找一种替代性教育的可能(Kardaszewicz, 2019)。聂保真等学者则研究了匈牙利的华人移民,讨论了早期移民和新近的追求生活品质的新移民在教育选择以及与祖国的联系方面的差别。1990年代来到匈牙利的早期移民采取了一种“跨国训练”(training for transnationality)的策略,把孩子们送到设有国际课程的全英文教学的私立学校里,期望以此让他们在海外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Nyiri, 2014);而新的富裕中产阶级的移民父母把孩子送到本地的公立学校,把匈牙利看作精致的欧洲文化和生活品质的代表(Nyiri and Beck, 2020)。对于移民海外的华人来说,尤其是在欧美等经济、教育水平较为发达的地方,在当地接受教育还是更为主流的选择,以获取更好教育为主要动力的新移民、投资移民尤为如此。目前针对二代、三代华裔的研究也更多集中在海外的华文教育以及在地国的文化适应等问题上(谷佳维, 2020;严晓鹏等, 2015)。

反向移民,无论是为了保持与祖国的文化连接还是为了更有竞争力的工作和职业环境,近些年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比如,有学者描述了二代西班牙华裔返回上海工作的反向移民过程(return migration),这是一种反向技术移民,即经济移民的后代回国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这一研究讨论了移民二代在不同人生历程(如暑假回国、求学和工作)与父母的家乡(青田)发展出的不同关系(Masdeu Torruella, 2020)。王蕾丝则讨论了美国华人二代在两种文化之间(cultural in-betweenness)的往返经历,强调了华人二代可以策略性地在工作中利用在美国学到的技能和对中国文化知识的理解,虽然他们也担心很快就会被在海外接受教育的高技术型中国留学生所取代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Wang, 2016)。

对于反向和寻根移民(return/roots migration),现有研究则讨论了这些移民二代回到母国接受教育所遇到的社会和文化适应挑战。有学者讨论了德国希腊裔二代的反向移民,发现他们的经历往往受到父母以及儿时希腊生活的怀旧情绪的影响。很多受访者在成长过程中都会不断变换学校和生活的国家,比如小时候会在希腊和祖父母生活,长大了再回到德国。他们描述了那种在哪里都永远是外来者(permanent outsiders)的感觉,认为自己悬置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King, Christrou and Ahren, 2011)。

现有针对国内反向教育移民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主要集中在华裔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生活适应等问题,比如一些研究认为,留学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语言不通与中外文化差异:“陈慧的研究认为影响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差序格局’、中国人看待‘自我’的方式、中国人对待朋友的方式及情境中心”(魏正子,2019:72)。也有不少研究针对不同生源地的留学生,比如非洲留学生,以及不同的留学生服务与需求之间的隔阂(温国珏,2020)。对于华裔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则有针对不同国别的分析,如泰北华裔(顾珈瑗,2020),以及基于问卷调查对华裔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影响因素的分析(兰茜予,2019)。

以华侨华人子女的反向教育流动为主题,我们可以发现,以“华裔留学生”来研究这一群体往往是结果导向的,忽略了在“来华留学”这一过程之前,很多华裔可能已经经过了多次、不定向的教育流动过程;从“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来探讨华裔留学生的适应问题也更多的是从中国文化的主体视角出发来了解他们的适应状况,忽视了其文化身份的多重性以及个体历时经验在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以适应与否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和目标,也更容易停留在学业是否适应、大学生活的日常体验等较浅层面,忽视了以教育的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历时教育过程的启发性意义。

王蕾丝对于卫星儿童(satellite babies)的研究同样回溯了已经成长为专业(或成功)人士的美籍华人二代早期成长于两种文化之间以及与父母长期分离的经历对于自身成长的影响,虽然王蕾丝反思了美国中产阶级密集育儿理念与中国式的大家庭养育模式的差别可能会加重对这种卫星儿童养育模式的污名化,她也并未否认早期的分离经历尤其是分离的处理方式对于这些华裔的情感经历有长期的负面影响(Wang, 2018)。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的重点在于反向教育流动,希望以教育人类学的整体观出发,挑战仅以结果(比如考上国内顶尖大学)为导向来讨论文化适应问题。这一分析框架试图结合华裔早期的教育经历,以及家庭、父母、主流教育观念、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来反思易被忽视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及探索这些问题的核心矛盾和文化根源。

二、家庭约束性教育原则与跨文化独立个体之间的冲突

在很多中国家长看来,为子女做决定,并选择最适合子女的求学方式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父母的重要责任。熊秉真对历史上的幼儿观梳理后发现,“传统幼儿观的主流……以近代的立场看来,似乎都显示一种以成人为中心的幼儿观,而且这个幼儿观所表现的‘目的论’或‘功能论’相当突出。换言之,中西历史上对儿童、童年乃至人的一生,一向持有非常强的‘作用性’与‘终极导向’的气质”(熊秉真,2008:39)。这种幼儿观已经被许多主流的研究者批判,如今的儿童教育观不再将童年当做一个被动接受、毫无意义的发展阶段,相反可能会“特别将儿童的学习过程视为积极习得而不是被动地吸收”,甚至在心理认知人类学看来,“儿童并非通过‘下载’来移植信息,他们的头脑充满具体期望、直觉和倾向,这让他们能够从与所处环境的信息联系中组织起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许晶,2020:3)。

一方面,儿童时期对于社会规范习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的传承之中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约束性教育文化是当代教育中若隐若现的被动性教育观念与行为,产生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而这种观念与行为作为一种文化滞后力量浸入人们意识与无意识的深层之中。”(庄孔韶,2000:43)

华人华侨二代受教育的情况和选择显然更为复杂和多元,与大多数普通华人子女相比,可能不是简单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出国留学)到大学(研究生)这样线性的选择。对于海外华人子女来说,要不要回国上学是一个需要时时被考量的选项,虽然要不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间的长短(正规学习还是暑期学校)具体因人因家庭而异(很大程度上还与移民家庭的经济和适应状况相关)。很多人都有小时候被送回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是绝大多数华人子女都经历过的,但是选择回国读小学甚至初高中、大学,经历两套学习体制甚至来回往返的还是少数。

1. 父母的强制性教育决定

Laura 和哥哥是生活在波兰的华裔。妈妈是他们教育的主要决策者和监督者,除了学校学习,他们还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包括运动、音乐,做额外的作业等等,夏天还会回国参加语言班、数学和历史的补习。Laura 描述了她妈妈在要不要送她和哥哥回国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纠结:

(所以你妈妈考虑过送你和你哥哥回国上学?)是的是的,在五年级左右是认真考虑过的,我妈妈几乎每天提。(回国学语言?寻根?)是的是的,这些都在考虑之中,我那时候经常很担心,就怕有一天起床发现门口已经装好了行李,买一张机票,我就被送走了。但是这一幕一直都没有发生,我妈妈到最后也就是说说。(所以她就是非常积极地考虑这个?)是的,她会说,比如“明年你就回中国上学”,然后我就开始哭,因为我真的不想去,我从我家亲戚的孩子那里知道在中国上学是什么样……(所以她没送走你们是因为你们反对?)现在我回过头想,我妈妈一直说其实就是想说服她自己,我猜其实她无法想象没有我们俩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和很多中国家庭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可以想象并且实施,为了孩子的发展就把他们送走,但是我妈妈没有这种勇气。多亏她没有,我如果被送回中国不会开心的。(R01-201808-WA -PL)

不过 Laura 的妈妈还是觉得波兰的教育太宽松、缺乏竞争,因此她在波兰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的学校的过程。在上高中之前, Laura 换了6次学校,她妈妈不断为她寻找更好的地方,在公立和私立之间转换。Laura 非常庆幸她妈妈最后只是频繁地在波兰换学校,而没有强行把她送回中国接受教育(如果真的送了,她也只能接受)。Alice 的例子则更为极端。她是一个中德混血儿,妈妈是德国人,爸爸是中国人。她的爷爷奶奶强烈希望她们接受中国的教育,最终他爸爸决定把她和妹妹送回国,所以她六岁的时候被送回广州上小学:

奶奶在广州做了决定,所以我和妹妹就得搬回中国。因为毕竟我们是中国人,需要学习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氛围等等。奶奶原来是在军队里面的,爷爷也是一个地方官员,所以他们习惯了发号施令。我们被命令过来,什么也不能问。(R02-201812- SH-CN)

对于 Alice 来说,在中国待的那几年给她带来了极大痛苦和创伤。其主要来源是非常严厉的、极端鼓励竞争的管教,而这种管教不是来自老师,而是她的爷爷奶奶:

我直接就去了小学一年级,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从德国的幼儿园,跟其他 10 个小朋友一起,直接到了一个班上有 55 个穿着制服的孩子的学校……所有人都要做到最好,尤其是在一个部队精英小学。爷爷奶奶也非常严厉。任何考试不能拿 90 分以下,有一次我考了 89……他们让我光着脚在门外站了两个小时,不让我进门。而且不仅仅是严厉,还吓我。如果有人告诉一个 6 岁的小孩,除非你考 90 分以上,否则他们就会给警察打电话,把你送到监狱里面,你就会相信的,而且这句话之后很多年都刻在你脑子里……那时候我不敢告诉我爸妈,所以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和妹妹就说我们在厕所……那段时间我们的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俩个都有肠胃炎。(R02-201812- SH-CN)

直到她们离开的第三年, Alice 的父母才意识到孩子们的状态不对,把她们接了回去。她们与爷爷奶奶的关系还是很紧张。 Alice 说回来后很多年,因为这些痛苦的经历,她和妹妹对任何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都刻意拒绝,完全不想想起,包括中文。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经历如此的深度创伤,但在海外移民家庭中,家长关于教育决策的这种强制决定却并不鲜见。

Camilla 出生在阿根廷,很小的时候回到中国,因为那时候她爸爸还在中国工作。她和爸爸在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妈妈从阿根廷来到中国。她的小学 1 到 6 年级是在中国上的,之后妈妈把她带到阿根廷,待了半年之后独自回中国,留她在阿根廷一边上学一边打乒乓球,她一直跟姐姐一起生活(姐姐比她大 10 岁),直到高中上寄宿学校。爸爸退休后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全家人回到阿根廷。现在她在国内上大学,家人在阿根廷。对她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停止职业运动员的生涯考大学:

本来我已经得了一些地区的冠军,但是很突然就不打了,我爸希望我上学,一开始打球也是他们希望的,(他们)给了你梦想,又突然拿走了,就很难受。(R06-201910-BJ-CN)

虽然让 Camilla 打乒乓球也是父母的决定,但是她很喜欢,一直认真训练,并且在各种体育比赛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有计划参加奥运会。但是父亲的决定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经历了一两年的低落后,最终 Camilla 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参加留学生考试,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

在 Laura, Alice 以及 Camilla 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回国上学”是其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并且时时被考量的一个选项,差别只在于是短期回国还是长期回国,与父母家人短期分离还是长期分隔两处。“回国受教育”对于华裔二代来说,当然不仅仅是去上学那么简单,在这一决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与国内国外往返流动相伴的,往往是父母(乃至祖父母)的绝对权威,以及子女的被迫被动接受。这种重大决定在父母看来是自己的责任以及权衡之后的“为子女好”的抉择,但在子女看来,它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自己对此几乎没有发言权,这变成童年生活盘旋不去的阴影。学业至上的考量,使得家长往往对于孩子可能遇到的社会适应以及心理、文化调试问题预期不足,而一旦出现了心理抗拒甚至家庭关系的紧张,这些负面经历往往是很难消除的。

2. 以学习成绩为主导的关注、忽视跨文化调试

“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尤其是使子女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教育目标和主要教育动力(Fong, 2006;张慧,2016)。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对教育的极端投入以及将考大学作为子女教育唯一目标的家庭也并不少见(Kipnis, 2011)。但是,对于这些二代移民来说,对于异文化的适应本身就面临着语言、文化和社交等的挑战,这种“只关心学习,不顾其他”的态度,在她们受到文化冲击的时候会产生更为负面的影响。

Irene 出生在加拿大,在加拿大上完小学之后转回国内上初中、高中,在国内上学时换过不同的城市生活: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我虽然算是三代移民,但是我们家好像对加拿大都没什么归属感,感觉就是去那边投资、工作,顺便把孩子生在那里。就像是我姥姥姥爷把我妈妈生在那儿,没有管她,就寄养在那儿,然后就自己回国了。我妈妈也是如法炮制。我妈在加拿大读到初中然后就回国了,我的经历跟她也是一样的,上完小学就回来了。

(回国)到上海读不下去的主要问题就是跟本地人合不来,还有很多韩国人,这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加拿大的日韩裔不多,他们(韩国人)很排外,有时候我不得不跟他们一起(去玩),他们就会疯狂地讲韩语,还看着我大笑。我的室友也是韩国人,会带很多朋友来房间里开 party。就融不进去,一边是室友开 party 一边我还得疯狂学习。因为学习压力很大,就很痛苦。在学校很痛苦,一星期回一次家,家里也不理解,父母看我好像看下属,感觉我完不成业绩一样,就很黑暗的一段时光。(R05-201905-BJ-CN)

对于 Irene 的父母来说,你好好学你的就行了,其他的那些事完全不用管。在加拿大的时候也一样,Irene 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在寄宿家庭里,他不爱交际,虽然学习很好(一直是班里的前 3~5 名),但这也成了被欺负的原因。因为被排挤,Irene 只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甚至开始觉得学校里学的东西太简单,才跟父母商量回国上国际学校,没想到国际学校的课程要求非常高、比本地学校还高,甚至还有另外一种文化适应的问题,在国际学校的生活成了一段“黑暗的时光”。而父母只是对她成绩退步不理解。之后她还遭受了另外一个至今完全无法释怀的打击:

读高中的时候暑假有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是亲戚家的小孩,因为那时候跟我同龄的本来就少,就玩得特别好。之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城市上学,本来是在 QQ 上联系,有一段时间他就没说话,我以为他忙,直到一年后家里人才告诉我,他得癌症去世了。我当时就懵了……你们怎么能不告诉我? 他们就说怕我伤心啊什么的……一想到我最好的朋友得了癌症,我都没能安慰他,没跟他说话(就特别无法接受)……(R05-201905-BJ-CN)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在家人看来,不告诉她是对她的保护,不让她伤心进而也不影响她的学习。这种出于对子女的保护或者认为孩子还小不告诉他们情况在中国移民家庭里也并不少见,王蕾丝对于卫星儿童的研究也发现,送孩子回国并与父母长久分开的这种重大决定,孩子们都是不知情的,“没人告诉她要搬回中国,以及会待多久”“好像他们为了要保护你所以什么都不告诉你”“他们说妈妈周末要出去一下,结果她就走了,再见到已经是三年以后……”这种分离尤其是隐瞒给这些孩子带来了长期的情感创伤,他们甚至因此无法再信任任何人(Wang, 2018: 24-29)。

Jen 出生在委内瑞拉,父母在当地认识结婚,开了一个中餐馆。Jen 出生两年后父母离婚,母亲觉得委内瑞拉是一个伤心地,决定回国生活。妈妈先回到上海安顿,Jen 则留在委内瑞拉和外祖母还有其他亲戚一起生活,两年后(Jen 10岁左右时)妈妈才把她们都接回上海。那时候,Jen 一直以为她们只是短期回国,所以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跟朋友们告别。她完全没想到就这样一直住下来,并开始在国内上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直到中考之后才有机会回了委内瑞拉一次)。当年学的英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她甚至一直以为自己跟国内的同学没有任何区别。高三的时候,她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参加高考,直到有一天一个跟她一样持外国护照的朋友过来问她:你知道我们不能参加高考吗?她非常吃惊,后来才了解到有针对外籍学生的入学考试。上了大学以后,她和其他留学生住在一起,又意外地重拾了“外国人”的身份。对于Jen来说,走的时候没能与当时的朋友告别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而家人可能觉得对小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也许很快就忘了,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忘。

这种“只管学习不管其他”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家庭中并不少见,“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没必要知道”的教育态度也很常见,但是对于这些年轻的华裔移民来说,一方面,他们的跨文化适应本身就面临着比其他同学更大的心理挑战;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新移民多数都有海外独立生活的经验,他们独立性更高、遇事自己想办法解决,也会有更强的知情意愿以及强烈的认为“应该如此”的价值观导向(无论是海外生活经历还是受教育经历所致)。在不同的涉及教育决策的冲突里,年轻的子女虽然最后大多都屈从了父辈的选择,但是这些内心的冲突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来

接受和消化,甚至对成年之后的社会交往、亲密关系的建立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三、两代移民之间的不同生活实践与 易被忽视的反向社会适应问题

很多研究都表明,对第一代(早期)移民来说,中国是家,最终都是要回去的。而第二代移民因为自出生或者很小就在国外生活,对于“家”并不一定有明确的指向。正如杜月引用的关于“旅居客”的分析中所论证的,移民是为了“回家”,“中国洗衣工……隔离于所处的社会,并且非常难以被同化。他是……‘旅居客’,并以‘回家’为目的来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经验”(杜月,2020:1-25)。关于第一代移民,李明欢也提出了“两个世界”理论:“对于第一代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日需要面对但始终感觉是陌生的‘他者’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他们想象中却总是充满亲情温馨的近在咫尺的属于‘自我’的世界……”(李明欢,2019:22)

关于华人移民,尤其是第一代海外移民的生活体验、身份认同、社会适应等问题的研究相当多,其对于移民的特点、原因、类别、数量等问题都有较为细致的梳理(李明欢,2019;王炳钰,2019)。也有研究讨论了海外华裔新生代的特点,认为其对海外所在国的价值认同度更高,也更关注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两代移民(及后代)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朱东芹等,2018;张慧,Kardaszewicz,2018)。

对于二代华裔来说,他们可能已经认同自己是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巴西人……他们会说流利的当地语言,并不认为中国是自己的“家”。正如爱玲博士所描述的返回上海的二代西班牙华裔的例子,返乡之前她的妈妈所说:“我们离开中国为了找工作,现在你回中国也是为了找工作,只不过中国不是你的国家,但是中国还是我的国家,虽然在这(西班牙)我一直是一个陌生人。”(Masdeu Torruella,2020:134)在讨论移民身份认同、身份协商、社会关系网络在移民中的作用时,刘双研究了澳大利亚华人,认为他们的经历更多的是两种文化的共存,而不是融合。澳大利亚华人在家是中国人(“Chinese at home”),工作的时候是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 at work”),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按照场景和群体在两种身份中切换(并以变色龙类比)。刘双提出使用“变动的身份”(shifted identity)而不是“混合的身份”(blended identity)来理解移民融入不同社会文化的努力,并指出对某种文化的认同(作为/像澳大利亚人一样)并不一定代表心理上的归属感(belonging)(Liu, 2015:26-35)。马斯登则讨论了社会隔离在意大利华裔群体的身份建构中的作用,描述了社会偏见在形塑移民的情感归属和认同中的影响。即使很多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混合的认同,但是由于社会隔离的阻碍,往往最后不得不退出当地教育(Marsden, 2014:1239-1252)。

本文所描述的华侨二代虽然有较早返回中国以及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受教育的经历,但是在海外的早期生活经历还是使之形成了与在国内生活者不一样的价值观,他们并不像父辈一样自然而然地认为回国就是回“家”。所以在反向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父母家人往往觉得这一适应不是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冲突不断。

1. “拆分型家庭模式”造成的社会性断裂

Jen回国上小学后一直是外祖父接送并负责辅导作业。妈妈工作很忙,很少能见到。之前在委内瑞拉也是外祖母承担了主要的照料工作。回国之后,一开始因为中文对她来说很难,其他的同学可能六七点就写完作业,9点左右就睡觉了,她每天做作业都要做到12点,是外祖父她给解释生词、成语。

从之前的描述中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与父母分离,尽管时间长短不一,在华侨二代中普遍存在。这种缺失也会造成社会适应困境。Jen描述了在学校被同学取笑,后来不得不隐藏自己海外生活的经历来融入并在交友的过程中习惯性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Alice与父母分隔两地的几年经受了严重的童年创伤,Irene也讲述了一直以来独自一人的痛苦:

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有亲情,再加上在学校就被欺负,到初中就跟不上,各种阶段都不顺,到爷爷奶奶带我,虽然生活上照顾,但是也不适应。一直都不适应,心理状态直到上大学都不是特别健康,对他人极度不信任,很抵触,就是我虽然跟你好但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那种。这个我现在好了,回头想,完全就是这种环境和经历影响的、给我带来的困难。小时候,有些人以欺负我为乐,我就是有点第二人格,暴躁的自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保护。我自己那时候不觉得,是别人告诉我的。就说我突然就爆发了,非常凶。上了大学以后,终于可以自己选择了,也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想自己待着就自己在房间待着,想见人就出去见人。见到的人也是什么样的都有,有完全的中国人,有完全的外国人,也有像我这样的,我是到了大学才开始觉得社交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R05-201905-BJ)。

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时,谭深提出了“拆分型家庭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由“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衍生而来,家庭拆分是在市场资源匮乏、制度资源缺位的不利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为了维持不得不分离的家庭,需要动员家庭和亲缘网络以保证留守儿童基本的正常生活和成长。(谭深,2011:146)这种被动的“拆分型家庭模式”会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亲情的缺失、亲情淡漠,以及一定的心理、教育、健康、安全等问题(谭深,2011:150)。而张翼、风笑天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也认为,“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他们而言,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风俗,心理承受能力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时的孩子处于最无助,最需要父母们多给予关心的时候,但是如果父母们忙于立足养家,与孩子的互动频率减少,缺乏沟通,忽视子女的成长,则可能导致流动儿童好妒忌、情绪不安、创造力差,而扭曲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极易使孩子形成消极回避的行为,偏离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张翼,风笑天,2003:44)。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相比,移民家庭无疑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条件(虽然可能同样面临较大的不确定风险),流入地往往是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地方,但是相比来说社会文化差距也更大,同样需要父母投入更多来帮助子女完成社会化过程。如果这一过程缺失,尤其是父母甚至与子女不在同一个国家,势必会引发不同程度的心理和生活适应问题。

2. 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冲突

Irene 描述了她回国以后对于隐私的要求以及生活在祖父母家的不适,这种不适固然与早期与亲人分离两地的经历有关,但也更多体现了不同文化体系下价值观的差别及其给她带来的社交困扰。

对于他们(爷爷奶奶)进我的房间我就特别特别抗拒,他们给我收拾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东西,收拾完我就找不着了,还会翻我书包,看我写的东西,想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甚至跟她们说,求求你们别再进我房间了,但他们就很受伤害。我玩游戏他们也会在后面看我玩什么。他们还跟亲戚朋友说我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后来我实在理解不了就去问我的同学,他们说对啊,我们父母都这样,我爸妈还翻我的卷子,看我考了多少分什么的。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我跟她们(的观念)不一样。(R05-201905-BJ-CN)

对于秘鲁的三代移民研究也发现了这种价值观的冲突,“面对背井离乡之苦,大多数移民都把子女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这种做法在1960年之后还存在,尽管当时在秘鲁已建有华人学校。除了中国的教育基础因素外,华人移民把在秘鲁出生的子女送回中国接受教育,主要是让他们学会其父辈信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习惯,加强他们的华人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某些情况下恰是他们回到秘鲁后产生内部冲突的原因”(帕德利西亚·卡斯特罗·奥万多,2016:19)。因为文化比较的背景不同,华裔后代往往在遇到具体生活问题时才发现自己与其他中国同学的不同,中外文化的潜在价值观冲突在不同情况下凸显出来。

3. 与中国同学的思维方式差异

华裔二代中大部分人之前都有在国内求学的经历,家里也主要讲中文,因此语言方面没有那么陌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使之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不一样,但是她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还是与中国学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并因此感到不适。她们也常常自嘲,虽然自己的语言和学习能力在留学生和华侨之中是很出众的,但是会跟中国学生刻意强调自己的留学生身份。

Sophie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生、长大。从4岁开始,她每年夏天会回国看祖父母。妈妈的父母是北京人,爸爸的父母在贵州。基本上Sophie中文的口语都是在与家人、亲戚的交流中学会的,因为家人、亲戚基本都不说英语。在家里她与父母是用Chinglish交流,大概三分之一中文,夹杂英文。但是来到北京之后,她还是遇到了很大的语言问题,与中国同学有距离。

我刚来的时候跟中国人说话会很紧张,他们说话就很快,我越紧张越结巴,就会说得很慢。后来我了解了他们说话的习惯(只是说得快,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看起来很凶,但其实没有恶意),可能主要还是我对中文很不自信,很害怕。现在就不会了。(R03-201910-BJ-EN)

此外,Irene觉得她跟中国同学在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与中国人的差距,玩的东西差不多,主要是节奏问题。因为我比起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热情和主动,跟外国人(的热情主动)当然还是比不了。语言没有障碍,文化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是很难成为亲近的朋友。而且我们系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是分开上课,也没有太多的接触的机会,所以我会主动去找一些中国学生上的课。但是,我的中文水平在留学生里面算好的,但是跟中国学生比的话还是属于中下(R05-201905-BJ-CN)。

4. 人情原则的复杂性以及与作为留学生的特殊经历

很多华侨二代之前在海外的经历让她们对于人情和人际关系没有那么自然而然的理解和实践,有时候她们还会觉得这方面压力很大,除了去工作、实习需要处理的校外的社会关系外(目前还相对简单,虽然一些人提到跟亲戚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在校内与老师的关系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Irene觉得,在国外,下课了跟老师聊一下也没什么,但在国内,如果你跟老师聊,感觉其他的同学都在盯着你,好像分数高是因为跟老师关系好一样,所以一般都会跟老师保持距离。Irene觉得有时候课下也不知道怎么跟老师相处,感觉好复杂。Camilla的室友是俄罗斯裔华人,Camilla感觉她室友就特别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有时候她跟老师说话之后室友会提醒她“你怎么能那么跟老师说话,应该这样那样”。她觉得毕业以后还是要回阿根廷,对这种人情的复杂性很不适应。

在大多数的大学,留学生与本地学生住在不同的宿舍楼(居住区)。留学生吃饭、生活的空间也与本地学生不同,除了上课会与本地学生在一起(但座位/教师也不固定),他们平时交往的主要是外国人。Jen虽然是在国内上的小学、中学,但是上大学以后因为自己的国籍变成了留学生。她在大学期间与本地学生的交往也非常有限,可能偶尔会合作一些课程作业,但是之后也就很少联系了: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国内的学生是四个人一个宿舍,舍友的关系往往很亲密,也不知道怎么能加进去。这个跟中学不一样,中学大家都坐固定座位,每天一起上课。大学就不一样,所以国际学生就会常常在一起。这里面很多人也跟我一样,我们算是中国人但是有不同国家的护照,大部分人都在中国学习生活了很久或者父母是中国人,我们交流容易一些,因为我们的背景差不多。(R04-201910-BJ-EN)

总体而言,学业上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华裔二代遇到的在反向移民过程中社会适应上的不适,这些不适既有回国上学的不适应,无论是语言使用的不熟练,还是思维社交方式存在差异,也有早期经历带来的社会交往上的障碍。

四、结 语

本文所使用的个案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就在于她们虽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和社会冲击,但是在学业上还是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但是这恰恰容易导致她们遇到的其他问题被掩盖。在她们所描述的一些朋友的案例中,因为经济状况不稳定,甚至父母的疏忽,一些华裔二代较早辍学,甚至出现了一些身体和心理问题。我们在温州的调研也发现,一些孩子因为多次往返于国内外,国内的学习跟不上,国外的节奏也融不进去,两边都不适应,只能早早辍学,等到了工作年龄就开始出去打工。本文并不是为了说明华裔二代都必然会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的问题,这一问题显然与家庭关系、家庭照料的安排、教育的选择,以及更大的亲缘社会网络、与所移民国家的文化相近性及不同个人经历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华侨华人二代子女往往具有两种或多种文化下生活的经历,与国内有着家庭、文化纽带,她们具备普通留学生所不具备的优势,理应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因此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以及他们遇到的社会文化适应挑战值得关注。

首先是“约束性教育原则”与“学业为先”这一态度的负面作用。以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华裔二代反向教育流动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约束性教育原则以及“学业为先”的考量对于这一有特殊社会适应需要的群体来说可

能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对于二代移民群体来说,一方面,多次的跨国流动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更多的语言、文化、社会适应问题;另一方面,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使他们较早地获得了与父母不一样的价值观体系,比如独立性、对“知情权”的要求以及对平等的期待,而“约束性教育原则”以及“学业为先”的考量都会给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带来更大的挑战。流动的特质使得华侨二代子女需要更多父母和家庭的支持来适应跨文化的挑战,而不是“只顾学习,不管其他”。

其次是多次以教育为导向的跨国流动与对反向社会适应的忽视。本文的案例可以看出,移民海外的生活并不必然是单向、有固定方向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很多移民认识到也许回国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他们在早期就非常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或者很早就送孩子回国接受基础教育以为考大学做准备。也有一些人在国外遇到了经济或家庭的变故而带孩子搬回国内。无论是哪种情况,海外移民群体都面对着多重不确定性,其子女的教育流动也呈现出多种变动状况。这种可能不断出现的流动状况尤其需要时时的社会适应,而这种巨大的变动往往又是在一种“突然”“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的。尤其是,在回国的问题上,家长往往认为,“这就是你的家,你会说中文,有什么好适应的”,这体现出父母对于子女回国的反向社会适应的预期不足。

最后是“拆分型家庭模式”造成的社会性断裂。如前文所述,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相比,移民家庭看似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本(虽然可能同样面临较大的不确定风险),流入国也往往是经济更为发达的地方,但是子女往往遇到更大的语言、文化与社会冲击,同样需要父母更多地投入来帮助其完成社会化过程。在本文的案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拆分型家庭模式对年轻子女与父母的亲密性、家庭交流、问题解决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会引发更为长期的社会适应困境。

可见,在中国日渐成为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华裔反向教育流动逐渐增多的大趋势下,虽然对华裔留学生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存在一定的倾斜,但是在社会适应和反向文化冲击的预期和调试上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外归国人才的独特优势。

参考文献: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杜月,2020,《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社会》第4期。
- 李明欢,2019,《欧洲华侨华人研究70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谷佳维,2020,《从留根教育到综合素质教育:西班牙华文教育发展的新趋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
- 顾珈媛,2020,《泰北华裔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个案研究》,《世界华文教学》第2期。
- 兰茜予,2019,《来华华裔留学生文化适应与适应策略调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 刘国福,2018,《引进外国人才政策:严峻形势、重大挑战和未来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刘谦,2016,《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基于美国费城安卓学校的教育人类学观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刘谦、姚曼,2018,《社区亚文化对家长参与模式的塑造——对费城华裔劳工阶层移民社区的田野观察》,《教育研究》第10期。
- 帕德利西亚·卡斯特罗·奥万多,2016,《秘鲁第三代华裔的价值观与土生性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齐凯、陈旭鑫、王雪娇,2019,《全球英才观下我国国际人才引进现状及对策》,《武警学院学报》第9期。
- 谭深,2011,《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滕星主编,2017,《教育人类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炳钰,2019,《新西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社交困境研究:基于“接触地带”视角》,《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
- 魏正子,2019,《在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综述》,《文教资料》第2期。
- 温国柱,2020,《在华非洲留学生文化适应策略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熊秉真,2008,《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晶,2020,《道德从何而来:心理认知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社会学评论》第4期。
- 严晓鹏、包含丽、郑婷等,2015,《意大利华文教育研究——以旅意温州人创办的华文学校为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张慧,2016,《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慧, Krzysztof Kardaszewicz, 2018, 《“一带一路”与波兰中国移民的演变趋势研究》,《人口研究》第3期。
- 张翼、风笑天,2003,《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新群体——论流动儿童所面临的畸形社会化》,《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
- 朱东芹、胡越云、孙达,2018,《多元视角下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庄孔韶,2000,《人类学与中国教育的进程(上)》,《民族教育研究》第2期。
- Fong, Vanessa L. 2006.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Shuang. 2015. "Searching for a Sense of Plac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46.
- Kardaszewicz, Krzysztof. 2019. "New Rules of the Gam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Poland."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8 (3).
- Kipnis, Andrew. 2011. *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Culture, Politics and Schooling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ng, Russel, Christou Anastasia and Ahrens Jill. 2011. "'Diverse Mobilities': Second-Generation Greek-Germans Engage with the Homeland as Children and as Adults." *Mobilities* 6 (4).
- Mardsen, Anna. 2014. "Chinese Descendants in Italy: Emergence, Role and Uncertain Ident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 (7).

Masdeu Torruella, Irene. 2020. "Migrants' Descendants and New Mobilities between China and Sp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8 (3).

Nyiri, Pal. 2014. "Training for Transnationalism: Chinese Children in Hungar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7).

Nyiri, Pal and Beck Fanni. 2011. "Europe's New Bildungsbürger? Chinese Migrants in Search of a Pure Land."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20(3).

Wang, Leslie. 2018. "Raised Between Two Family Cultures: The Lives of Chinese American 'Satellite Babies'." *Contexts* 17(4).

Wang, Leslie K. 2016. "The Benefits of in-betweenness: Return Migration of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 to Chin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12).

Reverse Educatio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Adaption of Second-Generation Overseas Chinese

ZHANG Hui KARDASZEWICZ Krzysztof

Abstract: China is emerging as a destination countr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Yet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hock of "reverse educational migration" – the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who returned to China for education. We draw on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successful students in elite universities to show how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challenges have enduring negative impacts on their socialization in China. We analyze how their experience is often defined by social rather than academic challenges through an education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We explained how conflicting education values, early separation from family,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contribute to their difficulties in social adaptation.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mostly focusing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young migran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redominant educational culture of "prioritizing academic success" in China has generated long-lasting difficulties for the reverse educational migrants, or returned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students, to re-adapt to their motherland.

Keywords: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education mobility; social adaptation

(责任编辑:黄盈盈)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